

积极发挥信阳地域优势 努力推动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

信阳军分区司令员 夏世富

展。

(二)突出大事大抓。推动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高标准抓好落实,一是认识要到位。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同为魅力信阳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密不可分。只有把二者协调一致起来,才能做到建设发展的步伐更统一、力量更凝聚、工作更合拍。二是统筹要科学。党委、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国防因素,不能顾此失彼,使国防后备力量建设陷入武装部门“一头热”的尴尬境地;军事机关要自觉把国防建设纳入信阳经济社会发展“总盘子”,不能自行其事,做到练兵与用兵、用兵与富兵、富兵与富民的高效统一。各级要从魅力信阳建设的全局出发,科学确定国防与经济建设布局,使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三是措施要得力。做到议事有位置、干事有氛围、经费有保障、落实有依据,把落实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法律法规的情况纳入人大、政府和政协的监督范围,定期组织军地联合执法检查组,对相关政策法规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以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促进各项工作扎实开展。

(三)强调军地合力。一方面,作为军分区系统,要发挥好桥梁纽带和参谋助手作用,向地方党委、政府主动汇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民兵预备役工作的方针、原则和上级军事机关下达的指示、要求,争取挂号;主动汇报驻军需求、重大军事活动、国防建设工程和民兵预备役工作的重大问题,争取支持。另一方面,地方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要在经济建设中贯彻落实好国防需求,着眼“市场”、“战场”的需要,经常深入驻军部队,紧紧围绕制约国防建设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究探索,及时了解国防建设之所需、之所急,形成上下协力、军地协作、职能部门协同建设国防的工作机制,保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衔接、同步发展。

二、紧贴形势任务,积极探索创新,勇于拓宽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加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

事斗争准备。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打赢未来什么样的战争、怎样打赢未来战争”两个基本问题,乘势作为,创造性地加速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

(一)抓好理论先导。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推进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深化,我市市场经济和各项改革事业的全面推进,给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带来许多崭新问题,例如,劳务经济的蓬勃兴起,使征兵对象的流动性大大增加,怎样解决民兵的在位率、专业对口率问题;后备力量建设正由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向应对多种威胁转变,怎样提高民兵队伍“双应”能力问题、怎样发挥好民兵预备役人员在建设“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中的参建参治作用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摸索。军地双方,特别是军分区系统,要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按照“打得赢”、“不变质”的总要求,集中力量进行研究,寻求有效对策,形成破解制约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举措,开创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新局面。

(二)搞好统筹规划。推动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涉及军队与地方,衔接国防与经济,关联平时与战时,是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统筹规划在先,搞好顶层设计。要正确处理好当前与长远、重点与一般、数量与质量、平时与战时、综合与专业、体制与机制的关系,把国防建设纳入全市经济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目标管理,纳入人大、政协执法检查 and 巡视内容,确保通盘考虑,同步推进。要以形成体系作战能力为目标,用国家武装力量“一体化”建设要求统领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打造战时前方作战、后方防卫互为补充的力量体系。要依照“合成、精干、高效”的要求,把国防动员体制与抢险救灾体制统一起来,建起军地兼容、平战一体、互联互通的国防后备力量指挥体制。

(三)走军民融合式发展之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为推动国防与经济协调

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市区域经济蓬勃发展,“六城联创”硕果累累,这在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上走军民融合式发展之路,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按照军民融合的理念,推动我市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一是国防教育上要融入。用好用活信阳红色资源,通过军地联教,把国防教育融入社会教育体系,合力组织。二是资源配置上要融汇。树立国家利益指导下“大武装”、“一盘棋”观念,能利用民用资源的就不另外铺摊子、能依托军队发展的就不另起炉灶,尤其在军民通用领域内,加大人才联合培训、互相交流、共同使用的力度,实现人才的共享共用,形成军地互促的国防资源配置体系。三是制度机制上要融通。军民融合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统筹协调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就要改变以往的军民分离的体制,抓紧制定出台相关的法规制度,努力实现军地双方由友情帮助向责任义务、无偿支援助向互利共赢、被动传承向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从而使军民真正地融合起来。

三、锁定质量效益,狠抓末端见效,努力提高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成效。

质量效益原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检验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尺度。推动我市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不是规模越大越好,规格越高越好、摊子越多越好,关键是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在质量效益上见成效。

(一)突出“军”字建队伍。信阳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战略地位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加之境内水库星罗棋布、淮河洪涝灾害频发,这对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民兵预备役具有亦兵亦民的特点,但信阳民兵队伍建设必须咬定“军”字不放松,要着眼后备力量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需要,按照“精干实备、双应一体、综合多能、反应快速”的建设目标,深入贯彻省军区“焦作会议”精神,推广普及我市民兵建设调整改革试点经验,从“规范建设标准,服务任务需求,提高“双应”能力”切入,进一步规范加强民兵应急维稳队伍建设,切实把处突维稳、防汛抢险、森林防火、抗震救灾等专业分队

编实建强,实现基干民兵由数量规模型、人力密集型向质量效能、技术密集型转变,确保遇有情况能够随时拉得出、用得上、起作用。

(二)锁定“实”字抓训练。军事训练是后备力量建设的一项重要重要的实践活动,是提升战斗力的主要途径。一个不能产生战力效益的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民兵预备役具有“寓军于民”的特点,抓好军事训练,必须深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大抓军事训练,大力推进转变”的指示,采取军地齐抓共管的办法,在“实”字上真功夫,摒弃“走步子、喊号子、抡棍子”的“老三样”训练套路。要按照“战时最能战,平时能应急”的要求,根据担负的任务,立足最困难最复杂情况,本着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担负什么任务,就训什么课目的原则,狠抓岗位练兵、挂钩联训、“接口、补差”训练,提高训练层次和质量;要建立训练通报制度,把训练态度、成绩与参训人员所在单位的提拔使用、评功受奖相挂钩;要制定相关法规制度,以硬性措施解决“抽人难”的问题;要建立抓训练的长效机制,研究制定检查评比、考核评估、奖惩激励的措施,破解困扰训练质量提升的瓶颈问题。

(三)盘活“用”字搞援建。维护一方平安、造福一方百姓是民兵预备役的重要职责,也是衡量民兵组织能否真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根本标准。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减速与我们周期性调整因素叠加重合,影响我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不断增加的情势下,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导向,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以发展现代农业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积极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参加“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既发挥好他们在维护稳定中的卫士作用、在执行急难险重任务中的突击队作用,又发挥好他们在推动“三个文明”建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中的模范带头作用,走好战斗力与生产力“双赢”的发展道路,达到在用兵中练兵强兵的目的,实现军事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赢,为实现“三大跨越”,推进“三大建设”,当好中原崛起生力军,加快魅力信阳建设做贡献。

城乡一体化要破除双重二元结构

□周作翰 张英洪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体制瓶颈,推进城乡一体化需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我们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有静态与动态两种形式。所谓静态的城乡二元结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农民与市民两种不同的户籍身份所形成的两种权利不平等的制度体系;而动态的城乡二元结构,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主要是农民工)两种不同的身份所形成的两种权利不平等的制度体系。如果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静态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行政力量主导的话,那么改革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内的数量外来人口向城市流动迁移所形成的动态二元结构则主要是市场要求的产物。当前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上,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开始注重于破除传统静态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比较忽视动态的二元结构。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发达地区各大中城市中的动态二元结构日益突出。以北京为例,200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755万,其中本市户籍人口1245.8万,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509.2万,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9%。在本市户籍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273.9万。在北京人口构成中,受传统静态城乡二元结构直接影响的是本市农业户籍人口,受动态二元结构直接影响的是509.2万外来人口,外来人口远多于本市农业人口。近些年来,北京统筹城乡发展、破除传统静态城乡二元结构的力度较大,成效显著。2008年北京农村安全饮水目标全面实现。2009年和2010年两年全面实施新农村建设“五项基础设施”和“三起来工程”,2009年“五加三”工程建设共投入83亿元,2010年预计投入70亿元。到2010年底,全市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将全面完成。北京还大力实施农村医疗、养老、低保、就业、教育、文化、邮政等民生工程,使轨道交通、水、电、气、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向农村延伸。但与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全国各大中城市一样,北京在破除城乡动态二元结构上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例如在城乡结合部改造中,当地户籍居民的安置问题容易受到重视,而大量外来人口的居住权益等问题却常常受到忽视。近些年来各个城市中日益凸显的农民工问题、“蚁族”问题、“蜗居”等社会问题,正是动态二元结构所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典型反应。

改革以来,我国城市的人口来源和构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居民主要由原居市民、郊区农民和外来人口三大部分组成,他们共同构成了城市的常住人口,他们都是城市的市民,共同为城市的发展贡献力量和

智慧,共同创造着城市的户籍与未来。要真正解决城市中的户籍农民与外来人口问题,建设具有开放包容和平等关怀的现代城市,就必须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首先需要树立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城乡一体化思维。所谓全面,就是要破除静态与动态两种城乡二元结构,树立既统筹兼顾当地城乡居民权益,又统筹兼顾本地户籍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的权益,逐步实现市民与农民、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身份平等、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既要使本市户籍农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也要使外来人口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

破除静态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静态的城乡二元结构有比较明显的城乡和户籍界限,这是当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工作重点和落脚点。动态的城乡二元结构存在于城市之中,它没有明显的地理界限,但却有显著的身份界限。

破除动态的二元结构,需要重新认识城市的外来人口。对于现代城市来说,其居民只应有职业的差别,而不应有身份的歧视,其居民也只应有先后之分,不应有内外之别。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曾提出重新认识首都“三农”的重要命题,他指出:“首都的农民是北京市民,是推动郊区发展的动力,是拥有集体资产的市民。”据此,在重新认识北京的外来人口上,也完全可以说外来人口是移居首都的新市民,是首都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拥有人力资本的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地要以破除静态城乡二元结构的精神来破除动态二元结构,要让普照农村的公共财政阳光同样普照城市中的外来人口,要将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样覆盖城市中的外来人口。

破除双重二元结构,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对于任何城市的发展来说,只有全面破除静态和动态的城乡二元结构,才能真正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只有统筹破除双重二元结构,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才能使城市郊区农民、外来人口与城市原非农业人口一样融为一体、休戚与共,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和城市外来人口等问题,有效应对城市快速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与挑战。也只有统筹破除双重二元结构,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才能使城市中的所有市民都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使城乡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据《光明日报》)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仅企业而且地方政府都被赋予了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能力明显增强。那么,地方政府在获得更多经济自主权后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呢?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自上而下的经济分权和地方之间的竞争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正确的激励”,不仅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而且推动了经济市场化改革深入。同时,我国长期实行的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核心指标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价办法进一步激励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但应当看到,经济分权的程度越大,地方政府基于竞争激励而干预经济的能力也就越强,于是就出现了地方政府利用被赋予的经济权力干预市场和经济活动的现象,这通常又会对经济发展乃至经济市场化进程起到抑制作用。

由此可见,经济分权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显著的倒U形曲线特征。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分权有利于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特别是能够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然而,分权程度超过一定水平后,反而会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起到抑制作用。地方政府由于“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有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经济自主权的增强,使其有能力通过财政支出进行基础设施等建设,同时从政策层面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和鼓励,以改善发展环境,吸引生产要素,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这无疑是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必须注意到,在我国现实条件下,政府是引导乃至主导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地方政府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力,“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锦标赛”会激励地方政府为了提

农民工问题的困局与出路

□何爱国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富挑战性与发展机遇性的问题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现象逐渐成为政府、社会与学界关切的一个焦点问题。围绕着农民工现象的起源、农民工问题的历史发展及其应对措施变迁、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深层困难、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前景与基本思路,学界、政府与社会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本文择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做些综述。

解决农民工问题面临哪些障碍

解决农民工问题任重而道远。整体看来,韩俊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障碍有如下五方面:户籍制度的城乡分割;劳动权益保护法律与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普遍缺失;城市公共服务的平等等待遇;作为城镇企业职工与社区居民的民主权利没有保障与落实。武力、郑有贵等认为包括历史遗留的习惯制度、城市基础设施不足、技能结构调整、就业竞争、缺乏知识与技能等方面。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农民工还存在种种限制与歧视,而且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使得没有文化和专业技能的农民工很难在城市稳定地就业。郭春丽认为,影响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城乡双重就业压力使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面临严重困难;二是我国面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艰难选择。

从思想解放、政治、制度等方面认识农民工问题

学术界也有主要从思想解放、政治问题、文化生活、户籍制度、农民工制度、“二元结构”等方面探讨的。国家发改委课题组主要从思想认识方面看,认为城乡关系虽然已经到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夜,但目前我们对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思想准备不足,思想解放不够,很多实践中已经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如农民工待遇与落户问题,

从经济发展视角看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高经济绩效而采取扭曲市场机制的行为,如被广为诟病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以及对于不同经济部门的歧视性政策(如选择性税收优惠)等。因此,过度的经济分权反而可能会使地方政府拥有过大的权力来干预经济运行、扭曲市场机制,从而不利于地方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表明,经济分权激励下的政府支出结构和支出方向以及相应的政府行为,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影响重大;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具有复杂性,在各种相关机制的综合作用下表现出倒U形曲线特征。

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财政(支出)分权水平已超过倒U形曲线所对应的最优值。这意味着单就经济分权本身而言,它对经济发展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的积极作用正在衰减,有的甚至会有负面作用。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会因此停滞。有关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各地区非公有制的比重总体上都在不断上升,但其推动力量主要来自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

总之,经济分权带来的竞争激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包括财政支出在内的政府行为,目前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因此,在新阶段的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应当着重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促使其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真正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

(据《人民日报》)

化国家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农民工体制问题,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与劳动人事制度,制定规划,采取措施,逐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周智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主要还要靠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借助政治途径来解决。包括全面清理和废除计划体制条件下出台的人为限制和剥夺农民和农民工权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加强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制法规建设,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职业资格分类制度,实行就业资格考核和认证制度,建立和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

彭贤则和崔彬认为,为了农民工人文精神方面的健康发展,要培植人文关怀的环境,构建人文关怀的体系,建立完善精神关怀机制。

但是,农民工有序转化为市民也还存在大量的市场、文化、技术、显性与隐性的制度障碍等诸多因素。孙立平甚至认为,城市越进步,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可能性越小。而目前的教育体制,无疑在加剧这种差距的扩大。

【相关链接】

农民工制度改革滞后论与“二元结构”深层阻滞论

陆学艺提出农民工制度改革滞后论。他认为,农民工制度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本来只是权宜之计,以后逐渐演变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但这种制度安排对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分不利,当前扩大内需,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也是不利的。

孙立平提出“二元结构”深层阻滞论。他认为,横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面前有两座大山:“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人为的制度因素导致的城乡关系断裂)与“市场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由于经济生活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所形成的城乡关系的断裂),因此,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不仅在于户籍制度,即使将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完全破除,他们想真正进入城市也相当困难。

(据《北京日报》)